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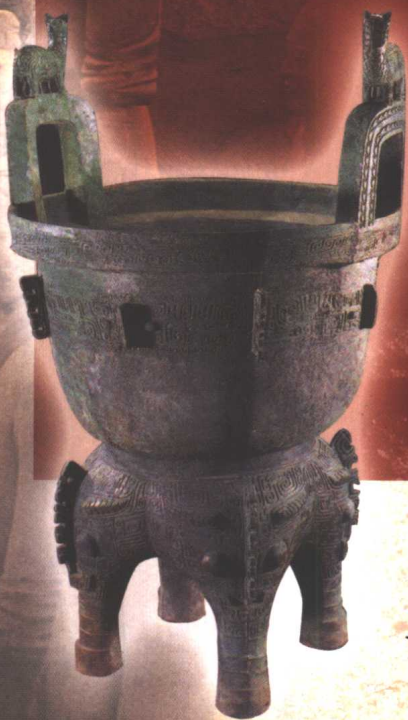
追寻远古的

呼唤



● 蔡凤书 著

百年考古学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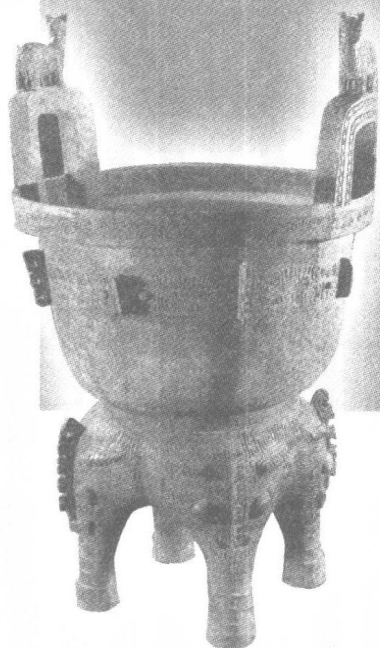
齐鲁书社



追寻远古的呼唤

● 蔡凤书 著

百年考古学历程



齐鲁书社

走近考古

目录



2/ 一、源远流长的古代考古学

16/ 二、近代考古学的序幕

32/ 三、战火中的探索

38/ 四、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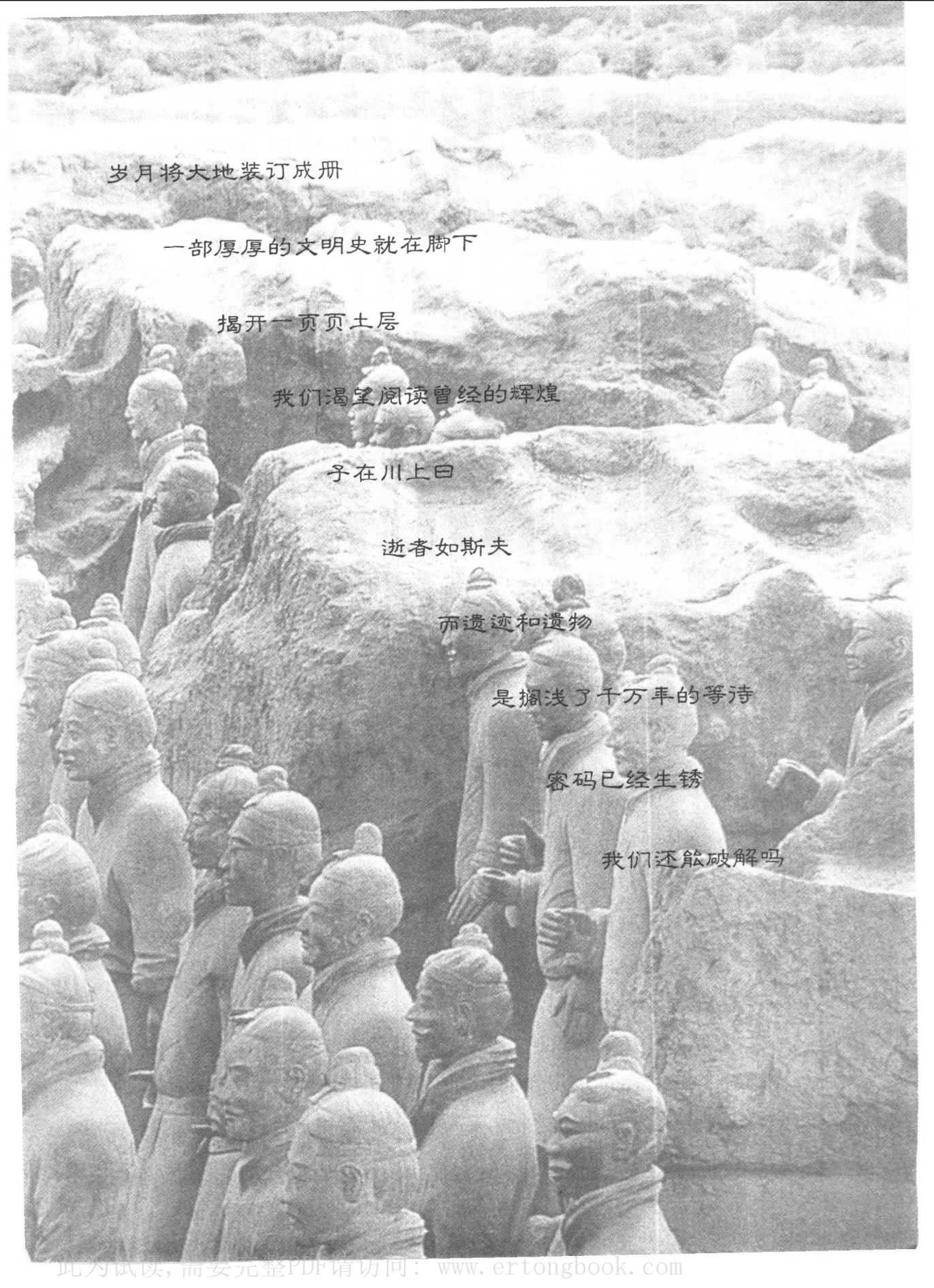


50/ **五、考古调查发掘的全面展开**

64/ **六、在十年动荡中艰难生存**

90/ **七、新中国考古学的第二个春天**

106/ **八、硕果累累的十五年**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the Terracotta Army of the Qin Dynasty.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number of terracotta soldiers standing in rows, facing right. They are wearing traditional Chinese armor and have distinct facial features. The background is a hilly, excavated landscape.

岁月将大地装订成册

一部厚厚的文明史就在脚下

揭开一页页土层

我们渴望阅读曾经的辉煌

予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而遗迹和遗物

是搁浅了千万年的等待

密码已经生锈

我们还能破解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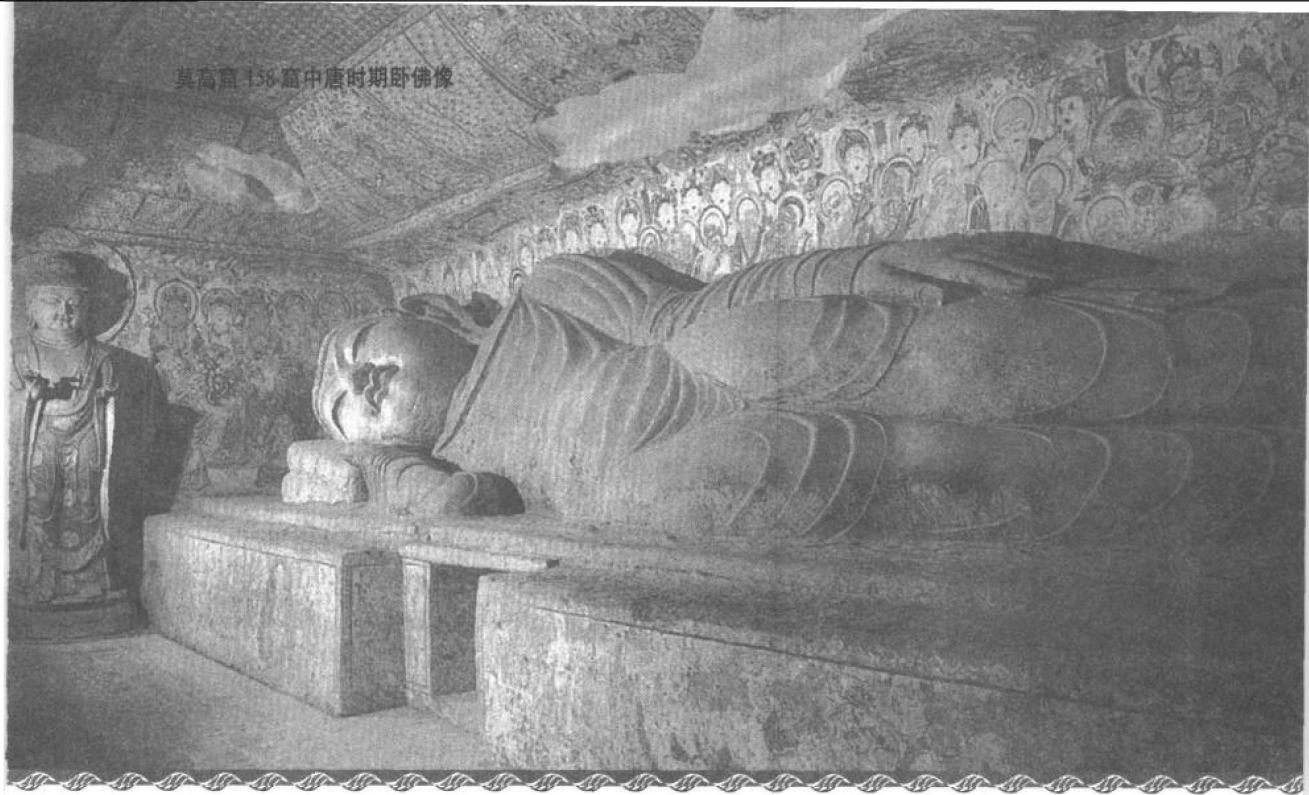
源远流长 的 古代考古学

人是从哪儿来的？到现在有多少年的历史？古代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使用什么样的工具？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吃什么食物？穿什么样的衣服？……这一连串的问题，时常会在我们脑海里出现。

在我国，盘古氏开天辟地、女娲氏抟土造人的神话，几千年来广为流传，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传说中古代人最初是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后来有巢氏构木为巢，神农氏教人稼穡，仓颉创造了文字，人们才开始走上文明的道路。事实果真如此？有没有办法可以证实？

和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中国人自古就有寻根问祖的传统。追寻历史的足迹，用实物资料展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正是考古学家的使命。

春秋时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曾经根据一个石镞（箭头）断定在遥远的北方到那时还生存着使用石器的部族。他曾经说过：“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坤》；我欲观夏



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我得乾坤焉。”说明他为了探讨夏代和殷代的历史曾到处奔波过。

传说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代帝王大禹曾经“铸九鼎”。进入阶级社会后，铜鼎、铜爵、铜觚、铜钟之类的宗庙彝器被认为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叫做“重器”，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间的战争，往往以掠夺别国的“重器”为目的。在古代，不要说掠夺别国的“重器”，就是连问及鼎的大小轻重，都被视为有夺取别人政权的野心。这种重视宗庙彝器的风气到秦汉时代依然存在。根据《史记》的记载，秦昭襄王掠取了周国的九个铜鼎，运回秦国的途中不慎丢失了一个，据说遗落到泗水里了。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东巡，行经泗水（今天江苏省北部），曾经专程派人到水中捞取，但是没有得到。此事不仅见于文字记载，而且在东汉时代的画像石上也可以看到“泗水捞鼎”的画面。

汉代的史学大家司马迁为了编写历史不辞劳苦在各地走访，

他曾经“上会稽，探禹穴”，会稽在今天浙江省绍兴市一带，禹穴传说是古代帝王大禹死后埋葬的地方。司马迁到湖南的时候探访过楚国诗人屈原沉渊的地点，路过北方时踏查春秋时代的长城，到淮阴时考察汉初名将韩信的坟墓，他还对东周时代的古代城址做过调查研究。这种以古代遗迹或遗物证实历史的学风，产生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大概在同期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据记载，西汉宣帝时代张敞曾对美阳（今天陕西省扶风县一带）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进行过考证，这可以说是中国古文字研究的肇始。从那时起到现在，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古文字的研究长盛不衰。

东汉时代的袁康在《越绝书》宝剑篇中写道：“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这儿所说的“兵”，不仅可以解释为兵器，而且在当时也当工具讲。这段文字说明早在 1900 年以前中国的哲人已经领悟到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石器、玉器、铜器和铁器的时代。我们知道丹麦人汤姆森（Tomsen, Christian, Jurgensen 1788—1865 年）把石器、青铜器和铁器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后提出的考古三时代（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划分法是在 1836 年，而袁康的提法比汤姆森早了 1800 年。

三国时代魏黄初年间（公元 200—226 年）西汉时代长沙王的坟墓被人发掘。根据文献记载，发掘的当时，不仅棺槨等葬具保存良好，而且死者的遗骸也保存了下来，据说死者的面貌栩栩如生。现代中国考古学研究证实，在湖南长沙地区确实有许多保存良好的战国

到西汉时代的墓葬。从 1972 年发掘的马王堆 1 号汉墓女主人尸体保存状态完好的情况看,这个记载是比较可靠的。

到了晋代,我们的祖先对古物和古遗址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人们对地下出土的古物不仅不再抱有神秘感,而且还要追根求源。晋太康二年(公元 281 年)有人在汲郡(今河南省汲县一带)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发掘了战国时代魏襄王墓(有的说是安釐王冢),获得竹书十车,竹书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竹简。这些竹简经过当时人的整理,得知其中有不少如《穆天子传》等失传的重要的古代文献典籍。有一部分后来编辑为《竹书纪年》,一直到现在仍然是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史的重要参考。

北魏时代(公元 386—534 年)著名的地理学家酈道元根据文献记载和他实地考察的资料写成了《水经注》,在这一大部头的著作中,酈道元将当时已发现的遗迹一一作了详细记录,书中记载了汉碑一百通,魏碑二十通等。

从南北朝到北宋初年(即公元 6 世纪到 11 世纪)中国萌芽期的考古学研究处于低沉阶段。这一时期尽管有 300 多年在文学、绘画、舞蹈、音乐、雕塑和建筑等文化上高度发达的隋唐时代,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一期间没有多少人关心古代遗迹和地下出土文物,也缺乏

历年十大考古发现(1990—2001)

旧石器

湖北郧县“郧县人”头骨化石

湖北江陵鸡公山遗址

贵州盘县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

江苏南京直立人化石地点

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

重庆丰都烟墩堡旧石器时代遗址

陕西洛南盆地旧石器地点群

河北阳原于家沟遗址

福建三明万寿岩旧石器遗址

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

欣赏古董的雅兴,更很少有人做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可以举出的仅有:唐人封演关于古代钱币研究的《续钱谱》六卷、吴协的《三代鼎器录》、徐浩的《古迹记》等。唐代贞观年间在陕西省境内发现了刻在如同大鼓样的石头上的文字,被称为“石鼓文”,现在的考古研究证明那是东周时代的文字。唐代诗人韦应物和文学家韩愈都写过《石鼓歌》,他们认为石鼓文是周宣王时代的遗物,但是仅此而已,很少有人再继续作深入探讨。只是到了晚唐时代,有位叫李吉甫的宰相在宪宗元和八年完成《元和郡县图志》,其中有一部分介绍了文物古迹。

宋代以降,随着复古思想的兴起,以研究古代青铜器铭文和石刻碑文为主要内容的“金石学”突然间发达起来。那时被看重的青铜器主要以商代和两周时代的为主,而当时人们关心的只是那些铸刻有文字的青铜器,对于没有铭文的青铜器缺乏足够的关心。只有少数人认识到通过青铜器的研究可以探讨古代的“礼”制和历史背景。北宋吕大临(?—1092?年)便是其中的一位。他认为研究青铜器铭文目的是“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以行于世”,“观其器,通其言,形容仿佛,以近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他将官府和民间收藏的211件青铜器以及一部分玉器集中在一起,按年代顺序进行了排比,并且将各个器物的尺寸大小、出土地点和收藏场所一一注明。不仅如此,他还在每件器物的后面附上临摹图和对铭文的考释,书名为《考古图》。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考古”一词,就是从这儿开始的。

和吕大临时代差不多的王黼和其他人合作将收藏在宣和殿的839件青铜器和镜鉴分成20大类,列举各个器物的尺寸,画出图形,临摹铭文并且进行了考证,出版了《博古图》三十卷。《考古图》

和《博古图》两书所使用的有关青铜器的术语诸如：鼎、鬲、簋、爵、卣、觚、觥、觶、饕餮纹、夔龙纹等都被今天的考古学家所沿用。宋代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二十卷，共收商周到秦汉时代的青铜器 510 件，可惜只临摹了铭文，没有绘出器物的图形。只是在铭文下面有释文，旁加考证。除此之外还有王厚之的《钟鼎款式》一卷和佚名《续考古图》五卷也都是宋代重要的考古著作。

北宋时代关于石刻碑文方面的研究，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2 年）是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历时十八年搜集各种铜鼎铭文、碑志和法帖千余种，写成了《集古录》。他不仅是搜集，而且做了许多考释，他在《集古录》后面写的《集古录跋尾》就是很优秀的考证文。另外，赵明诚（1081—1129 年）撰写的《金石录》也被认为是金石学研究的代表作。王洙的《啸堂集古录》二卷于 1176 年刊行，共收青铜器 345 件，虽然临摹了青铜器上的铭文，但是未做考证。洪适的《隶释》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考古著作。

比《考古图》和《金石录》的时代还要早一些时候，乐史（公元 930—1007 年）奉敕编撰《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可谓洋洋大观，其中有多处记载了各地的寺观和古迹。

北宋熙宁九年（公元 1076 年），宋敏求博采群书之长，考证了长安城的古代遗迹，写成《长安志》。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我们研究盛唐时代长安城的基本资料。

北宋绍圣四年（公元 1097 年），李诫奉令编修的《营造法式》是现存时代最早内容丰富的建筑学著作，对我们了解古代建筑是极为重要的参考。

金人在东北地区建国，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在军事方面曾经烜赫一时，但是在文化上的建树几乎无可称道。虽然他们常常从宋、

辽等国掠夺到不少古代遗物，但是由于其文化水准低下，往往以为这些古物是不祥之兆而加以毁坏。《大金国志》上记载“海陵正隆三年，诏毁平辽宋所得古器”就是证据。

元代和明代尽管统治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在金石学的研究上没有多大进展，古代遗迹和遗物也受不到应有的重视，元朝是蒙古人统治的天下，由于其文化水平低下，不重视地下和地上的文物古迹，而且常常毁坏古代的石碑用来造佛塔。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元朝色目人葛逻禄乃贤（生卒年代不详）于1363年撰写《河朔访古记》十六卷，书中根据他亲自的考察，记载了北方各地的城郭、宫苑、寺院和陵墓等遗迹。

明代正处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从上到下偏重于务实，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当时人也不重视古代的遗迹和遗物，他们竟以石碑铺路，作为皇帝的明思宗还毁坏古物以来铸钱，这些事实屡见于历史记载，和宋代相比，金石学呈现出衰退之势。

到了清代，在思想领域中一度兴盛的实学渐渐被程（颢）朱（熹）理学和考据之学所代替。尤其是清初，由于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汉族士大夫阶层为避免招致杀身之祸，只好埋头于故纸堆，在金石学和考据学中寻求庇护的场所。乾隆、嘉庆年间兴起的所谓“乾嘉学派”由于在考据学领域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名声大振。

清代的金石学家们研究的范围不仅局限于青铜器铭文和石刻碑文的考证，而且还把视野开阔到印章、封泥、瓦当、货币等各个方面。更有甚者把发现的地下文物和古代文献记载相对照，进一步考证其用途和源流，从而将研究推向纵深。例如清代中期的程瑶田（1725—1813年）就把发现的文物与古代文献《周礼考工记》相对照，研究了古代的车子、钟磬等乐器以及戈戟等武器。

清代不仅民间的学者研究活跃，而且高层统治者们也对古物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清王朝统治者们一方面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安抚怀柔的措施。例如康熙皇帝就集中了一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编撰大部头的丛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除了组织人员编撰《四库全书》之外，还敕撰了《西清古鉴》四十卷。该书编撰历时三十二年。书中搜集了商周到唐代一千多年间的青铜器 1529 件，文图并茂，是清代关于青铜器方面最大部头的著作，至今仍然是考古学家的重要参考书。《西清古鉴》成书三十年之后，又有王杰等人奉皇帝的命令撰写了《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和《西清续鉴乙编》二十卷，皆于乾隆年间刊行。

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和积极鼓励，清代的考据之风大盛。此风一直到晚清时代不衰，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 年）根据钱坫、阮元、曹载奎、吴荣光、刘喜海、吴式芬、徐同柏、朱善旆、吴云、潘祖荫、吴大澂、刘心源、端方、罗振玉等十四家的研究成果作成《清朝金文著录表》六卷，书中收集了 3200 多件器物。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威逼下，我国的国计民生遭受到严重的威胁，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许多有识之士再度呼吁提倡实学，强烈批判那些不关心现实生活、只顾进行繁琐考证的乾嘉学派。以撰写《海国图志》而闻名于世的魏源（1794—1857 年）说：“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彼钱谷簿书不可言学问矣，浮藻短钉可为圣学乎？释、老不可治天下国家矣，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大骂理学家们是“书蠹”。这样，考据之学再度失宠，转入沉寂。

19 世纪末叶虽然中国人民处在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境地，但

是各地连续不断的重大发现，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文物古迹的重视，同时也唤起了民族的自尊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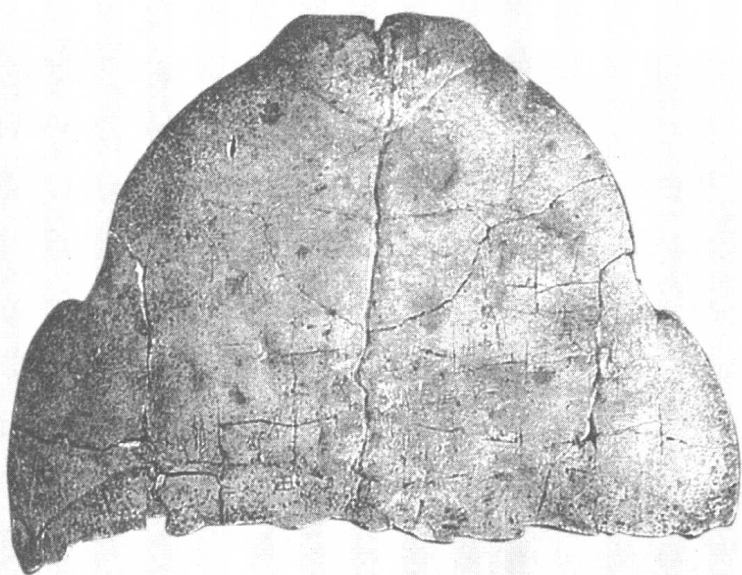
首先要提及的是 1899 年在河南省安阳甲骨文字的发现。

根据文献的记载和考证，河南省安阳（旧属彰德府，今安阳市）以小屯村为中心的地方是商代“盘庚迁殷”的“殷”所在地。从盘庚到帝辛（殷纣王）一共 273 年的时间，安阳小屯一带一直是殷帝国的首都。周武王灭掉殷帝国之后，这个昔日繁华的帝都渐渐荒废，垦为农田。但是由于世代口耳相传，人们知道此地曾经有过辉煌过去，所以小屯被人们称为“殷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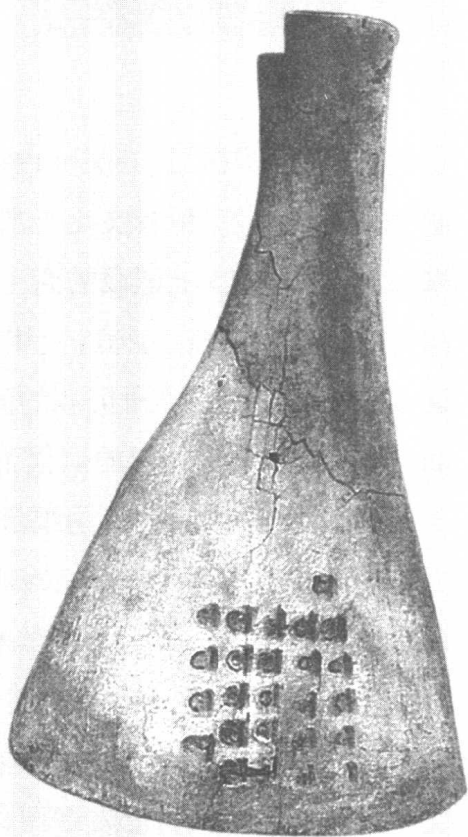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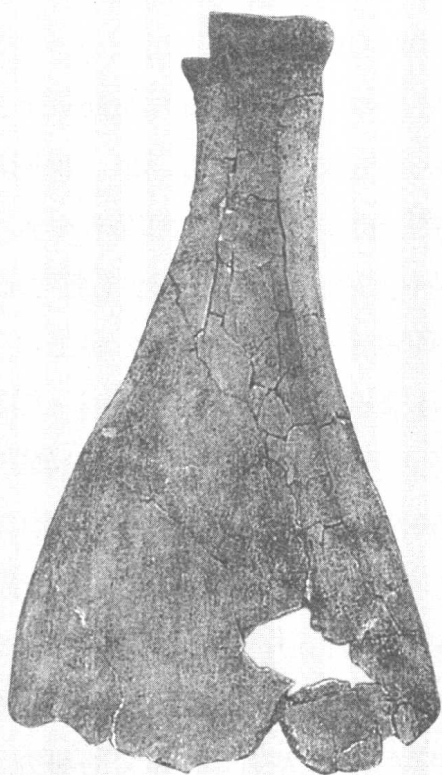
1899 年，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王懿荣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从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材上发现有用刀刻上去的文字。所谓龙骨实际上是一些从地下掘出的牛或鹿的肩胛骨、乌龟的腹甲，也有古脊椎动物化石，据说“龙骨”可以治疗刀枪的创伤（有说可以治疗疟疾的）。王懿荣凭直觉认定龙骨上的刻字是古代的文献记录，于是他从药铺大量收购“龙骨”，先后大约有一年的光景，所谓“甲骨文”一词也在此时产生。虽然王懿荣本人在古文字方面的造诣很高，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便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王懿荣在抗暴中以身殉国。

此后不断有人搜求这种带字的“龙骨”，确认这是当时已知中国最早的文字载体。

商人很讲究迷信，事无巨细动辄将乌龟壳经过钻、灼，再看其上的裂纹，以判断凶吉。我们现在所谓占卜的“卜”字，是个形声字，最初就是烧灼过乌龟甲上裂纹的象形，发音则是烧灼时龟甲爆裂的“PU”声。商人把问卜的内容刻在牛、羊、鹿的肩胛骨或乌龟的腹甲上，经过占卜之后还要将验证的结果用同样方式记录下来，这种



卜甲 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南地出土



卜骨 河南安阳殷墟小屯西地出土



王国维

刻在骨头或龟甲上的文字就是甲骨文。甲骨文所包含的内容丰富，有天文、地理、农业、畜牧、祭祀、礼仪、战争、祭祀活动、刑罚和其他历史事件等等。

甲骨文被发现和确认之后，引发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的搜集和研究。以写《老残游记》而闻名的刘鹗（1857—1909年）在1903年出版了甲骨文的第一部专著——《铁云藏龟》。孙诒让（1848—1908年）在1904年出版了《契文

举例》二卷。罗振玉（1866—1940年）在1910年出版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首次肯定甲骨文出土的地点就是殷代帝王的国都。长期以来人们对《史记》上记载的商王朝世系表示怀疑。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出现的王亥、王恒、上甲等商代诸先公、先王进行详细考证，证实《史记》、《世本》所记载的商王朝世系并非凭空捏造，而是可信的；同时他肯定受祭祀的商代帝王有康祖丁、武祖乙、文祖丁（即康丁、武乙、文丁）之称。王国维最早把对甲骨文的研究突破了局限于文字的考释，而将其作为原始的史料用以探讨历史、地理和古代礼制。后来，罗振玉、董作宾、郭沫若、胡厚宣、孙海波、唐兰、于省吾、陈梦家以及港台、日本和欧美等地的学者在甲骨文字的研究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目前已经释读出的甲骨文字有2000多个，占已发现甲骨文字的一半左右。甲骨文的研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美国、英国、日本、瑞典、俄罗斯、德国等国也很盛

行，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方式搜求甲骨，许多大学或者博物馆都有收藏，研究甲骨文的专家也很多。所以“甲骨文学”已经不但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巨大关注的学问。

其次是敦煌密室的发现。

众所周知，位于甘肃省西部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自4世纪起人们在那儿开石窟、造佛像，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诸代一千多年，形成了以莫高窟和西千佛洞为中心的艺术宝库。在近千米的崖面上洞窟鳞次栉比。据统计共有洞窟492个，现存壁画总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彩色塑像2400余身。莫高窟在明代曾一度荒废，到清康熙年间再度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一世界闻



莫高窟45窟盛唐新塑菩萨像